公元前 1800 年前后至公元初年前后，是云南古代历史发展上的青铜时代。这个时代是云南考古发现成果最丰硕、文化特点最鲜明的一个时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早中晚三个时期。春秋晚期之前是漫长的逐步发展期，此后直至西汉早中期是辉煌的成熟巅峰期，西汉中期以后到东汉初是从衰落到消亡的嬗变期。到了东汉早期，汉文化因素彻底占据主流，云南青铜时代就此终结。

1938 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金鼎先生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先生指派，从昆明前往大理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海西马龙遗址的第三、第四层文化层中发现了青铜器，由此拉开了云南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也是云南境内首次发现青铜器的最早记录。云南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以此为始至今已有 80 多年的发展历程，80 多年来，围绕着构建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及编年体系这个中心任务，云南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大量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20 世纪 3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是起步阶段，其时云南青铜文化遗存的发现多是被动的，数量少，工作范围也仅局限于滇中的滇池盆地和滇西的洱海地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石寨山古墓群的发现及四次连续发掘。其中在第二次发掘的 6 号墓葬中出土了金质蛇纽“滇王之印”，第一次以实物形式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武帝“赐滇王王印”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古滇国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当时引发的轰动效应绝不亚于今天的三星堆。石寨山古墓群的四次发掘，以数量惊人、造型独特、内涵丰富、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向世人充分展现了云南青铜文化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格及发达程度。相关学术研究也基本是围绕着石寨山古墓群的考古发现来展开的，滇文化作为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及其在青铜文化研究中的中心地位由此确立。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随着专业考古机构的成立、专业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改革开放后基础建设项目的日益增多，考古工作主动意识明显增强，工作范围不断扩展最终覆盖云南全境，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积累了一大批基础资料。滇中滇池盆地至滇东地区滇文化的发现与发掘的工作重心一直没有改变，滇西、滇西北、滇南和滇东北地区一系列重要墓地和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则进一步显示出云南青铜时代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研究方面，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使相关考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这一时期，云南的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区系类型理论和方法，对云南各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了分区分期研究，深化了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是云南青铜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进入 21 世纪，云南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迎来了一个转变期。首先，在配合持续增多的大规模基础建设项目的过程中，新调查发现的遗址和墓地数量持续增加，单个遗址或墓地的大规模发掘屡见不鲜。在金沙江以南、洱海以西的怒江、澜沧江和大盈江下游干流流域，积累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过渡阶段的遗址资料，填补了青铜时代遗存在此地域分布上的空白。其次，逐步辨识出了一批实为青铜时代，但此前被误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云南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开始清晰起来。第三，滇中的滇池盆地和滇西的洱海地区仍然是此阶段考古工作的重点区域，滇中地区开始把关注的焦点从墓地转向了与之关联的遗址，洱海地区典型遗址的精细化发掘则直接推动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分期标尺的建立。最后，随着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取得显著进步，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开始突破传统研究范畴，延伸至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聚落考古、冶金考古等新兴研究领域。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云南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仍然方兴未艾，新发现、新材料继续积累。另一方面，考古工作思路转向了强调主动意识、课题意识和开放合作意识。依托大遗址考古项目的长期系统开展，着力夯实关键地区关键遗存关键时段的基础工作。田野考古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和国际化。多学科合作研究成为常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层次不断深化，这些都为云南青

铜文化突破性研究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特殊的历史人文，云南的古代文化在青铜时代早期就已呈现出区域性自成一体独立发展的特点。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云南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滇中、滇西、滇东北、怒江澜沧江下游几个大区。滇中以滇池盆地和玉溪三湖地区为中心，代表遗址有晋宁上西河乙区、古城村、河泊所早期遗存、金砂山、海宝山早期墓葬、海口大营庄和通海兴义二期。滇西以剑湖、洱海为中心，代表遗址有剑川海门口二、三期、大理银梭岛三、四、五期。滇东北以昭鲁盆地为中心，以鲁甸野石山遗址为代表。怒江澜沧江下游以干流及部分支流为中心，代表遗址有景东丙况、景谷南北渡、白银渡、龙陵大花石、潞西尖山等。与新石器时代相比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有以下几个特点：石器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工具仍然被广泛使用；各地陶器组合多为新的器类所取代，繁缛精美的纹饰基本消失，装饰风格趋于简练；发现的青铜器数量少，器类以锥、刀、铃、镞、鱼钩等小型器为主，红铜多于青铜，个别地点发现炼渣、矿石和石范，青铜制造已初现端倪。当时已有定居农业活动，渔猎、采集、家畜驯养等在部分地区成为主要生业模式。

从公元前 500 年前后开始，云南各地青铜文化的演化进程明显加快，到了西汉中期达到发展的顶峰，逐渐形成了部族林立的局面。从考古材料来看，此时期形成了滇中、滇西、滇西南、滇东南、滇东北等几个特征鲜明的文化分布区，与古代文献记载的西南夷若干族群基本对应。滇中的滇池盆地和玉溪三湖地区主要是滇人的活动范围，早期考古发现以墓葬为主，典型墓地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昆明羊甫头、澄江金莲山等，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特征可看出当时滇人社会已经出现贫富差别和等级分化，社会发展程度已达到了云南青铜文明的最高阶段。滇西地区是昆明人的活动范围，典型墓地有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祥云检村等，除土坑墓外，石棺墓是昆明人的另一种墓葬形制。滇西南以保山昌宁为中心的地区是哀牢人的活动范围，土洞墓是其独有的一种墓葬形制，典型墓地有昌宁大甸山、坟岭岗等。滇东南以文山广南牧宜地区为中心主要是句町人的活动范围，其控制区域从云南东南部直达广西西部及越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墓葬形制又有不同，高等级墓葬多为浅穴土坑带封土堆。除此之外，还有分布在滇中以东今天嵩曲盆地一带的遗存，以曲靖八塔台墓地为代表，在墓葬形制上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多个小型墓葬由早及晚持续堆垒形成大型土墩，一个墓地往往有数个土墩。尽管该墓地所出陶器、铜器等随葬品与东边的滇人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自身的地域特征亦非常明显，这类遗存可能属于与滇人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族群。曲靖师宗大园子墓地以及在罗平县境内新近开展的考古工作可能为寻找漏卧族群提供了一些线索。在青铜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因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部族聚集生活在不同的地理单元，各部族文化既独立发展各具自己的地域特色，又相互交融表现出一定的联系，同时与来自北方草原地带、西北甘青地区、南亚东南亚等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展现了云南多民族格局的早期面貌。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中央王朝在云南设郡置县，汉文化强势介入，云南青铜时代的土著文化因素开始衰落。考古资料显示，各文化区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汉式墓葬，部分墓葬形制表现出过渡阶段的特征，在滇中、滇东北、滇东南等地区发现的墓地中，汉、夷两种类型的墓葬共存的现象亦并不少见，个别遗址还发现了一定时间内可能存在夷汉分治的迹象，说明汉文化对西南夷土著文化的取代并非短时间突变的结果，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渗透融合的演变过程。

云南青铜时代考古是西南边疆考古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由于完整的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及编年体系尚未建立，诸多关键问题的讨论仍然困难重重。尽管如此，滇中地区近年来积累的聚落遗址材料已为这个关键地区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部分学者也开始注意到传统平地农业社会的文明发展模式在解释云南山地文化形成时似乎力不从心，对云南古代文明形成发展模式的讨论需要新的理论模型。以云南为中心

的古代西南边疆如何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时代新命题则为未来云南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石寨山古墓群出土“滇王之印”

祥云大波那墓地出土铜锄

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铜弯刀

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铜剑鞘